

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 / 丁文江之死与他不信中医 / 重新认识医学家余云岫 / 陈方之及其医史研究 / 动物入药的起源与医疗价值问题 / 为什么无效的治疗被认为有效? / 中西医结合的一桩惨痛事件 / 鲍林晚年的失误及其启示 / 保健品及其泛滥的根源 / 人参有效吗?

思想

的

果实

——
医疗文化反思录

祖述宪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SIXIANG DE GUOSHI

思想^的果实

——
医疗文化反思录

祖述宪^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想的果实：医疗文化反思录/祖述宪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436-5778-6

I. 思... II. 祖... III. 医学：人文科学—文集 IV. R-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 第 168290 号

书 名 思想的果实：医疗文化反思录

著 者 祖述宪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0532）85814750（兼传真）（0532）80998664

责任编辑 郭东明

责任校对 周晓方

封面设计 青岛出版设计中心·乔峰

照 排 青岛海讯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1000mm)

印 张 20.5

字 数 35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5778-6

定 价 30.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0532)80998826

前 言

文化是知识、信念、态度、习俗和规范的综合体,构成一个社会或民族的行为模式或生活方式。文化是后天习得的,任何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都受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文化塑造。文化具有保守性,虽然随着社会的进化不断发生变迁,但传统的保护性十分顽强。文化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于大众的健康和疾病发生,以及对于医药和预防的信念、态度和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我国在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事项中,也必须考虑到相关的文化因素。上个世纪 80 年代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倡导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关于健康的社会科学的教育,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医疗文化。因此,我在文化人类学和医学史,特别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不同的医学发展道路,我国传统医药的变迁及其与哲学、政治和社会的关系诸方面下了一番学习功夫,做了一些研究。这本集子所选的文章,主要反映我在这方面的思考。

由于我对中医的评说与有关当局和流行的观点不同,属于少数派,因此我不厌其详地下浓重的笔墨,以明确的概念、充分的理据、周密的逻辑和细致的表述来捍卫我的观点,批评谬误,明辨是非当仁不让。我认为这是讨论问题唯一正确的态度。我对中医的这些评说不是标新立异,更非故作高深之见,而是讲一些简单的道理,对于头脑清晰、愿意思考的人来说只是科学的常识。然而,常识敌不过胡说,已是一种“常识”。当前学术不轨、学风浮躁在中医文章上尤其突出,《读书》等杂志上一些才俊们写的文章,常是下笔千言,言不及义,或不知所云。反科学思潮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即使在发达国家,科学也难敌迷信。^[1]中国是科学输入国,这种现象泛滥似乎也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我国一直缺乏学术讨论的风气,懂得正常进行讨论的人也不多,严肃的讨论很难进行,有的常是不讲理据、不按逻辑、自说自话和胡搅蛮缠的斗嘴和文字游戏。对于成见在胸、利益相关者和习惯于只接受结论而不愿意独立思考的人来说,我的观点可能被认为是过激或异端。不过我

的这些文章大都在几年前的刊物和网上发表过,迄今还不曾见到过批评性意见。其原因可能由于认真读书的人太少,或人微言轻,没有引起意见相左者的注意。这也正是我把这些文章结集成册的原因。

清代学者颜习斋有言:“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2]颜元是学术史上的大家,我是不能企及的,更不敢以先觉自居。但是,无论如何这是做学问的人应有的态度。三百年前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古人都有如此大的勇气坚持真理,敢于表达与众不同的意见,教育后觉,我们现代人更应当发扬科学精神,为民族和大众的利益追求真理。在讨论中医问题的文章中,我引用了很多前人的文字,并非我不能把这些并不复杂的道理说清楚,而是因为我对先知先觉前贤们的尊重,他们的话也确有妙处;再则国人崇拜名人的风气很盛,运用名家之言,或许有助于启发民智。

这本书里还收录了与我的专业有关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虽然不是论文,但反映了我的一些有意义的观点,如《对我国健康狗带狂犬病毒说法的异议》,已经证明是正确的,被学界和当局所采纳。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树立有利于大众健康的文化,现在却彻底走向反面,各种媒体不仅充斥着伪医假药的广告,而且还充斥着大量为伪医假药铺平道路的“理论”。《保健品及其泛滥的根源》和《滥用注射是严重的医疗陋习》等文是对不良医疗文化的批评。《上个千年医学上的伟大成就》和《上个千年医学上的科学巨人》是借千禧年的机会来传播医学史知识的,读者从中可以了解现代医学发展的大致脉络,懂得医学大厦不是古人的哲思玄想的堆积,而是靠一代代人实际的观察和实验,不断弃旧图新所构建起来的。

我的这些文章多数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尽管编辑对我的文章网开一面,但仍然难免受篇幅的限制,压缩了文字,或磨去了棱角,未能尽言。现在收集在本书里的文章都恢复了原貌,有些做了些修改补充。受学术写作的影响,我的文章大都附有比较详细的参考文献或注释,表明立论有根有据,不是信口开河;引言尊重作者,不断章取义,同时便于读者追究,也避免抄袭之嫌,提升著文的严肃性。由于原文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参考文献或注释的格式互不相同。本书是献给一般读者的,因此把参考文献和注释结合起来,采用注释的方式对文章中的专业性内容多做一些解释,供读者参考。但是我自觉做得并不如意。

在我进行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总是对业师苏德隆教授(1906~1985)心存感激。他的教诲使我终生受益。我的一些学生和青年朋友对我的写作帮助不少,他们帮我在国内外的图书馆检索文献,或者协助校对文稿,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祖述宪

2009年3月10日

【注释】

[1] ① 刘易斯·托马斯及其《最年轻的科学》,见本书。② 约翰·拜纳姆:《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国的科学与卫生普及》,钮卫星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③ 诺曼·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8~261。

[2] 颜习斋(1635~1704),名元,习斋为号。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河北博野(今安国县境)人。引文自《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学问篇》,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151。

目 录

前言

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	(1)
《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的新证据	(21)
丁文江之死与他不信中医——对张起钧与伊广谦有关丁文江之死两文 的批评	(31)
重新认识医学家余云岫——研究与批判中医的先驱	(48)
我国近现代哲人评中医	(92)
陈方之及其中国医史研究 附:陈方之著:旧医学之回顾	(119)
动物入药的起源与医疗价值问题	(134)
为什么无效的医疗被认为有效?	(154)
中西医结合的一桩惨痛的事件	(171)
鲍林晚年的失误及其启示	(176)
保健品及其泛滥的根源	(196)
人参有效吗?	(210)
碘保健品无益可能有害	(213)
(一) 碘不是保健品	(213)
(二) 碘摄取过度有损健康	(214)
(三) 为山东单县小学生服“碘钙营养片”发生不良反应事件致卫生部 发言人的一封信	(215)

（四）碘盐为什么要专卖？ (217)

从童子尿煮蛋流行谈起 (219)

 当众喝尿令国人蒙羞 (222)

滥用注射是严重的医疗陋习 (225)

欣弗事件的教训 (231)

为制造销售美沙酮毒品犯刘应泉判处死刑案致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的一
 封信 (234)

萨斯病爆发事件引起的思考 (240)

对我国健康狗带狂犬病毒说法的异议 (250)

劣质检测试验导致“健康狗带毒”假象——一个典型的实例 (255)

批判性阅读的重要性——对一项研究往事的反思 (258)

“爆发”与“暴发”二词在医学上的正确应用 (265)

刘易斯·托马斯及其《最年轻的科学》 (268)

上个千年医学上的伟大成就 (279)

上个千年推动医学发展的科学巨人 (302)

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

提要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一贯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但是，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在几部有关他的生平和传记著作中，根据胡适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认为中医陆仲安早年治愈过他的“糖尿病、慢性肾炎和心脏病”，因而断言胡适相信中医药。为此，笔者仔细检阅了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年谱，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尽管 1920～1921 年胡适生的那场病，开始有医生怀疑可能是心脏病或肾炎，但很快就被否定了。胡适第一次冠心病发作是 1938 年年底客居纽约时发生的。实际上，中医陆仲安为他治疗的只不过是胡适自己所说的“小病”。因此，胡适一再申明他根本不曾生过糖尿病和慢性肾炎；陆仲安治愈胡适糖尿病等疾病的说法纯属讹传，或有人故意造谣。胡适自称是“信仰西医的人”，并且支持朋友批评中医。本文列举胡适批评中医的一些言论，这些批评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问题的缘由

19 世纪末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型时期，门户开放、西学东渐，各种新思想不断涌入，使面临民族危亡、文化和经济停滞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激烈的震荡。这个时代造就了一批独立思考、开一代新风气、指引新文化方向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倡导学习西方，宣扬民主和科学，批判专制、愚昧和一切陈腐的传统文化，鼓吹创立新的文明。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们自然持批判的态度。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对中医的态度不是例外。^[1]

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关于胡适的几本书中却认为，中医陆仲安治好过胡适的病，因而他相信中医药。^[2,3,4]一本是《闲话胡适》，专写有《胡适相信中

医药》一章，^[2]另一本是《胡适琐记》，其中有两篇题为《名医陆仲安》的文章，专门叙述此事。^[3]由于前书的作者石原皋，“与胡适有乡亲关系”，后书的作者罗尔纲是与胡适过从甚密的受业弟子，因此，他们的说法更令人觉得可信。但是，胡适一贯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且明确指出，现代医学只能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上产生，“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5]所以，我们必须把上述作者的立论证据，仔细考察一番。

这些作者说胡适相信中医的根据，是因为胡适在1921年3月30日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简称《题研经图》），记述中医陆仲安为他治病的情形。胡适的《题研经图》全文如下：^[6]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于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7]

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减，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8]心里想象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作化学的分析，锅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

这些作者认为，胡适的《题研经图》赞扬陆仲安治愈了他的病，他相信中医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胡适晚年有人提及此事，或向他询问陆的治疗“肾脏炎”和“糖

尿病”药方时,他矢口否认得过这些病,也不相信中医药能治好这些病。他对陆的评价只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9]

胡适对中医陆仲安治病的态度似乎先后有所不同,他在《题研经图》中对陆的赞扬,与后来的否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令有些人困惑。于是,罗尔纲断言胡适“说假话”。他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事实。”^[4]罗尔纲的臆断有根据吗?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个事件的真相。

陆仲安为胡适治好了什么病?

要回答陆仲安为胡适治好了什么病,首先必须弄清胡适究竟患了什么病。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20年10月18日,“今秋以来,先生患病多日,诊治久不见效。友人马幼渔介绍陆仲安中医师替先生诊病。”^[10]11月11日,胡适复日本友人青木正儿的信中说:“我的病还不曾全好……病中不能多谈。”^[11]11月18日,开始服陆仲安的药方,但未提及患什么病。^[12]只是在他翌年的《题研经图》中有“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炎”,但后来都否定了。^[9]然而,半个多世纪以后,石原皋的回忆却说:“早年,胡适患肾炎……请陆诊治。陆的处方以黄芪、党参为主,分量特别重。普通药罐盛不下,乃用砂锅煮药,节制饮食,多吃鱼肚,清炖,不放盐,完全淡食,难以下咽。胡适坚持下去,经过陆仲安的精心治疗,他的肾炎居然全好了。”^[2]罗尔纲根据石的这些文字,加上他与胡适有“乡亲关系”,并且曾在北京住过,便肯定石原皋“明确地记明他的病是肾炎”,是“千真万确的事实”。^[3]白吉庵著的《胡适传》中则称:1920年7月2日胡适到南京讲学,8月26日返回北京,“自南京回来后,经常生病,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我曾致函白先生,请教这话的出处,得到的答复是“未查到写作引用的细节资料”。^[13]他也根据《题研经图》,认为陆仲安用中药治好了胡适的病,所以“他是相信中医的,但希望提高、科学化”。^[4]

一些中医对此事当然津津乐道,不仅肯定胡适生过这些病,而且随心所欲地渲染他的病情险恶至极,以衬托陆仲安的医术高明。中医陈存仁擅长哗众取宠的通俗文字,影响最大。上世纪60年代,他在香港的《星岛晚报》上开了一个专讲吃

喝的专栏,后来集结成书,在一篇讲“山药”的文字里写道:“民国九年,胡适之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患了很严重的糖尿病和肾脏炎。胡氏初由协和医院医治,但经治疗多月,非但未见减退,反而日益严重,全身浮肿,小便有血,院中诸医束手无策。那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示意马幼渔教授,介绍北京名医陆仲安氏替他诊治。陆氏重用黄芪和怀山药,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势霍然若失。一时全国震惊,认为不科学中医,竟能用中药治愈标榜科学、风靡欧美各国的新人物的绝症。”“后来,林琴南也患了同样的症候,又经陆仲安治愈。林为了感谢陆氏,特地画了一幅‘秋色研经图’送他。在这张图末,胡适之也写了一段跋文详记陆仲安治愈他病患的经过。”^[14]陈存仁无中生有,把胡适的病情及其治疗经过编织得活灵活现。其实,胡适根本不曾有过“全身浮肿,小便有血”,而药方里也没有山药或怀山药;说马幼渔教授介绍陆仲安是“蔡元培示意”,也是子虚乌有。胡适的患病显然是在林纾作《秋室研经图》之后,而不可能如陈存仁所说的胡适生病在先。此外,林纾作图以谢陆仲安,是因为林的第五子林璈“病瘰”就诊于陆仲安,他“研经而得效,因为《秋室研经图》以赠”,而不是陈说的,“后来,林琴南也患了同样的症候,又经陆仲安治愈”,因而作图表示感谢。近年,大陆重印了陈存仁写的几本往事回忆的书籍,被一些文人所吹捧。我认真核对过两本书中的几处重要事实,发现他的说法是捕风捉影,或颠三倒四,漏洞百出。

近些年,上海的两位老中医也不顾事实,把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事说得神乎其神。^[15,16]其中一个陆仲安次子陆震的弟子,她称曾聆听陆震的口传:“胡适的病,先是糖尿病,后兼患慢性肾炎,继而又引起心脏病,至仲安太老师求诊时,并发症日趋严重。”甚至“西医认为病已不可治,仅尽人事而已……嘱家人准备后事。胡适回家后忧虑万分,以为‘在劫难逃’。”^[15]另一个也是这套耸人听闻的说法:“1920年11月18日,胡适因久患糖尿病,被诊治已久,胡氏心悦诚服、死心塌地的协和医院,宣判为‘死刑’,词曰:‘无法挽救,速备后事。’”“胡归,遑急万状,家人惊慌无计,连颇有名望的西医好友也支持协和医院的诊断。”为了不致“坐以待毙”,经“劝导再三,胡适遂勉强从之。中医至,诊毕,(指陆仲安)曰‘此易事尔,饮我此药如不愈,唯我是问。’胡服陆的药后,即见转机,后竟霍然而愈”。^[16]他们知道胡适是“提倡新文化,连带中医也被斥为‘不科学的代表’”的人,因而对胡适进行冷嘲热讽的攻击。^[16]1994年《上海中医药杂志》报道,江苏的一位中医仿照其父所录的陆仲安治胡适糖尿病的方子治疗“消渴病”,举出一例,证明“确有良

效”。^[17]这些说法毫无根据,与胡适当年记述的病情缺乏共同之处。虽然现今医学发达远非昔日可比,但任何稍具常识的医生,都不敢夸口能够治愈糖尿病和慢性肾炎。

后来胡适的确发生了冠心病,最后因猝发心肌梗塞逝世,但他头一次发病是1938年12月4日赴纽约演讲,晚上在一家旅馆里发生的。为了避免家人牵挂,他在翌年3月14日才写信告诉妻子江冬秀。^[18]

实际情形是怎样的呢?我们应当看看胡适自己是怎么说的。胡适生前勤于写日记,但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和大陆出版的《胡适的日记》,^[20]只是其中一部分,可惜1920年的日记尚未发现。^[21]不过,他在1922年11月15日及其后几天的生病日记中说,这次的病情很像前年,即1920年的病,所以,我们大致可以通过这段时间的日记来了解那次生病的情况:^[22]

11月15日:病来了!十五[日]夜觉左脚酸痛,理书时竟不能久站;细看痛处在左脚踝骨里面,面上有点肿。睡时又觉两腿筋肉内酸痛。脚肿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

11月16日:因脚肿,告假一天。

11月17日:昨夜醒时口干,小便加多,也很像前年病中情况。出城访陆仲安,请他给我开一个方子。

11月18日:病渐好,上课,办公。11月22日:上课。出城诊病,换一方,检药后,回家吃饭,已两点钟了。

胡适这次生病的特点,一是单侧(左)脚肿伴有酸痛,二是口干和小便增多,都“很像前年病中情况”,所以他再次请陆仲安开方子诊治。这与俞凤宾在《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一文中所述“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有点相似。^[23]但是,在陆仲安开方子的第二天,即11月18日,他的病就渐好,去上课、办公了。根据这些病情的描述,除了“尿中含蛋白质”外,他的病与肾炎毫无相似之处:肾炎的浮肿不痛,早期的突显部位在颜面,尿少而非“小便加多”,况且胡适的蛋白尿仅此一次,后来反复验尿未再出现,更不可能是慢性肾炎。在1922~1923年的日记里,他多次提及发生脚腿肿痛,有时影响活动,颇以为苦。这也许就是 Woods 博士说他的病是 Erythema nodosum 的原因。^[24]

1922年12月29日,胡适因发现尿中有糖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检查。^[25]1923年1月5日他在《杂感》一文中说:“受了三十次的便尿分验,三次的血的分验,七日的严格的食料限制”,证明他的糖尿是“生理性”的,而不是糖尿病。1月6日出院时,胡适在《努力》第36期上发表一则《胡适启事》,声明“此次诊察的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25]但“脚肿与不安眠”究竟是什么病,医生不肯给“一个简单的答案”。脑系科专家 Woods 博士说是一种“Trofo ‘neurosis’,其特别专名为 Erythema nodosum”,而内科专家 Smyly 博士不以为然,“但没明说是什么病”。胡适对于未获确诊毫无怨言,反而认为正是他们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因为科学精神的第一个条件是不肯轻下判断”。(下划线着重号是胡适日记原有的)^[26]大约5个月后,即5月21日的日记中说,两次请黄钟医师诊治,黄和外科牛惠生医师为他验过小便,蛋白和糖均为阴性。黄说他没有病,只是“心与肺皆不甚强”,给他开了两种药,“一种强心,一种治肺”。^[27]这些结果充分说明胡适没有患肾炎或糖尿病。

由于胡适患糖尿病和慢性肾炎被中医治愈的传言有意或无意的广泛流传,向胡适询问药方的信也不少,下面是他的几封复信内容。

1958年,胡适致余复洋的信中再次否认这些谣传。^[28]他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只是“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仲安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29]这个令胡适愤怒的造谣中医就是陈存仁。

1960年1月12日,胡适给刘峙的回信说:“我从来没有患过糖尿病,报纸所传,全是瞎话。竟劳先生函询,使我不安。关于我患糖尿病的传说,最早见于某种《中国医学词典》。我也屡次更正,但传说至今未绝,我也懒去更正了。随时更正无稽的传说,颇似‘与影竞走’,永不能断除的。”^[30]1961年4月初,《民族晚报》连载的《国父北上逝世》一文中,记有胡适在1920年患糖尿病,服了陆仲安的药才好的。胡颂平问他有没有吃过陆仲安的中药,他说:“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但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他开的药方,被人收在一本好像是什么《药物大辞典》里……完全是瞎说。”^[31]胡适所说的《中国医学词典》和《药物大辞典》,即陈存仁1935年所编纂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来陈又在《津津有味谭》里“瞎说”,青年学生余复洋写信询问胡适治糖尿病的药方,正是看了这

篇文章。^[30]

1961年,胡适在复沈某的信中郑重申明:“在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此说全无根据。”又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32]

胡适的说法与当年的日记完全一致,前后丝毫没有矛盾,他对肾炎和糖尿病的认识是很准确的。这两种病至今仍如他四五十年前所说,都是持续终身、无法治愈的。问题出在俞凤宾写的一篇记述陆仲安为胡适治病文章,把题目误作《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恰巧一年后胡适又曾因一次尿糖阳性住院检查,于是那个黄芪药方就被想当然地治愈了胡适的“糖尿病”。上海的何老中医不仅说胡适服药后“霍然痊愈”,还挖苦他因此“延活寿命数十年……又过了些政治瘾”。^[16]这只能说明,他不仅对历史人物胡适无知,而且医学常识也非常有限。

上世纪20年代,医学还不发达,我国的医疗技术设备也差,医生诊断失误是常有的事。名人胡适生了一次“小病”,由于错误报道和炒作,药方因此载入中医药书刊,造成一剂以黄芪、党参为主的中药方,治好了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三种难治之症的讹传,成就了一位名医陆仲安。而且,几十年来不断受人注意,产生不小的影响。

医学是科学,具有普适性和连贯性,而非一时一地之物。一种药物或疗法如果真实有效,必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禁得起重复的,只在个别病人身上出现的“奇迹”,或只能由少数名家高手的施治方显有效,注定是不可信的。要是陆仲安果真有妙手回春之术,治愈了胡适的慢性肾炎和糖尿病,那些药方现在也应该有效。可是,虽然我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建立了不少设备精良的实验室来研究中医药,当年胡适所梦想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的情景已经实现,然而中医药的疗效依旧没有得到证明。现时有些医生或医疗机构声称有根治慢性肾炎、尿毒症或糖尿病的方药或“祖传秘方”,但不论打着什么旗号,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江湖骗子。现今的医疗虽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如胡适所说,糖尿病已经有了有效的药物,只要耐心接受正确的医疗,大多数都能得到控制。慢性肾炎最终会发生尿毒症,除少数接受肾移植可长期生存外,只能对症治疗。有些病人听信传言,一味追求秘方草药治病除根,那一定会上当受骗的。^[33]

胡适的病究竟是不是陆仲安治好的呢？胡适在断断续续病了两个多月以后，接着服陆给他开的中药，历时三个月零三天，到作《题研经图》时“病现在竟好了”，总共大约半年时间。根据常识和评价临床疗效的基本原则，没有理由把胡适自己所说的“小病”痊愈归功于陆仲安的治疗。在那个年代，医学尚不发达，有效的治疗极少，多数疾病的“治愈”实际上是“自愈”，即病人自身修复机制作用的结果。学养有素的医生都深谙此理，有些医生的名声实际上是“贪天之功”。^[34]

《闲话胡适》是石原皋在六十多年后对胡适一些往事的回忆，有些是道听途说和个人议论。对于这类记述当然应取审慎的态度，即使是当事者本人的回忆也未可轻信。何况这是石的暮年之作，真实性是应当考虑的。他自称“家世操韩康之业”，少年时代就“对中国药发生兴趣”，后半生又生活在崇奉中医药视同政治信仰、不容半点质疑的社会环境下，晚年仍迷恋于中医药研究，信仰“中国医药是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中的宝藏之一”，这些足以使他的回忆受观念的限制，难以客观真实。退一步说，即便他的回忆正确，至多也不过说明胡适曾经服过陆仲安开的药，当作“肾炎”治疗过，但究竟是不是肾炎，是不是中药治好的，他是不可能下判断的。而且在这篇不长的文字中，就有两处记述与胡适当年的记录大相径庭。

一是说胡适“患痔漏，没有找西医开刀，而到上海找潘老太婆医治”。^[2]幸有胡适日记为证，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胡适曾患肛瘘，反复发作，使他十分痛苦，日记颇详。1922年7月的发作，是在协和医院由谢元大夫行手术治疗的。7月16日，“陆仲安来诊看说是痔疮，今天谢大夫说不是痔，是一个 Ischic Rectal Abscess。”^[35]1923年五六月间，胡适在上海肛瘘反复发作，是请黄钟医生诊治的。^[36]此外，还有江冬秀寄中药方、江润生姊等劝用中药，遭友人反对。9月15日胡适的日记中说：这次发作试了亡友洛声生前寄的“外痔药”，结果“口虽收了，今天他竟作脓了，肿得很大，坐时很有点痛苦”。^[26]在日记和书信中均未发现有“潘老太婆医治”的记述。

二是说胡适“得了急性阑尾炎，是马上进协和医院，动手术切除的”。^[2]而梁实秋则另有说法：胡适“有一次乘船到美国开会，医师劝他割掉盲肠再作海上旅行，以免途中万一遭遇病发而难以处治，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术。”^[37]虽然阑尾炎那时称作盲肠炎，但二人所说的临床情况很不相同。在胡适的年谱、日记和家书中，均未发现有胡适患急性阑尾炎、进协和医院手术的文字。1937年2月1日的胡适日记说，上午协和医院电话通知他，“有空位，可以入院”；下午江冬秀送他去住

院,并“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如洗肠子、剃小肚毛之类”。2日,由“Dr. Loucks 为我开刀,用脊骨麻醉”,于16日出院。^[38]这里缺少胡适因什么病、做什么手术的记录,但可以推测是下腹部手术,用的是当时盛行的腰椎麻醉,即胡适所称的“脊骨麻醉”,但不大可能是急性阑尾炎的手术。因为他不是如石原皋所说“马上进协和医院”的,术前准备“洗肠子”也是急性阑尾炎所禁忌。再看此前5个月,即1936年9月3日胡适给妻子的信中说:“医生劝我早点开刀,把病除去,就可以没有后患了。有几天小肚子颇不好,高起的地方竟收不进去。现在每晚上睡下就把高处揉进去,进去很容易,医生说不要紧了。”^[39]这段描述提示胡适患腹股沟疝,俗称“小肠气”,所以这次手术很可能是择期进行的疝修补术,医生所说的“后患”是指疝嵌顿和绞窄。

胡适对中医的态度

1920年秋,胡适患病迁延数月,加上社会人事的纷扰,颇有些厌倦情绪,连服陆仲安的药方三个多月,到1921年题《研经图》时“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可见他很高兴。我们不能苛求胡适那时能对自己的病愈和服陆的中药方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作理性判断,何况他不是医学家,而陆仲安则因为名人胡适治病而名声大噪,不断向胡殷切问候,感激涕零。胡适是重感情、待人宽厚的人,朋友间礼尚往来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此后不到三个月里,他两次登门拜访陆仲安,一次是送衣料,另一次是代人问病。^[40,41]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药石无效,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虚名,有人推荐让陆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乃推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初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不得不前往。中山先生先是婉拒,胡适考虑到陆已在侧,只是说“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42]

胡适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早年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他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43]“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要禁得起理智的评判,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44]他强调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